

军备竞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

[英] 约瑟夫·梅奥罗

内容提要：工业革命之后，军备竞赛作为促进战争的危险因素，逐渐登上大国政治的舞台。在研究军备竞赛与战争的作用机制时，学界存在“螺旋升级”模式和“威慑（失败）”模式的分歧。本文作者通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国军事对抗，指出军备竞赛升级失控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具有独立的作用。为了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先后采用“极权主义”方式扩张军备，威慑未果的英国、法国、美国不得不先后效仿进行对抗性军备扩张。军备竞赛的施动—反应循环升级超出各参与国事先预期，对战争爆发的时机与战争的蔓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军备竞赛 螺旋升级 全面战争 极权主义

“军备竞赛（arms race）”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欧洲并非偶然。政治实体间的武装对抗自古有之，但是被学者称之为“军备竞赛”的高强度军事竞争则是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化为武器制造带来革命性发展。欧洲各国的陆军把握住了普及电报与铁路所带来的通讯与交通领域的重大变革，而海军则纷纷用钢铁船体、蒸汽机和螺旋桨取代之前的木帆船。工业生产与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相应而生的是欧洲各国愈发迫切地努力跟上潜在对手的发展步伐。这一急切性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战争（1866—1871）后尤其更加突显，普鲁士通过这场战争向欧洲其他国家表明，当新技术和实行大众兵役制的军队与系

[英] 约瑟夫·梅奥罗（Joseph Maiolo）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战争研究系教授，迈克尔·霍华德战争史研究中心（Sir Michael Howard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War）主任。

统规划相结合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战争带来迅速而决定性的结果。¹

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之前，国家间军事竞赛十分激烈。这似乎能够说明，军备竞赛作为新的促进战争的危险因素，已经成为大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诸多权威性陈述中，1914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勋爵（Lord Grey）颇有建树。对于格雷勋爵来说，历史的教训显而易见：“正是大规模军备扩张不可避免地引导各国走向战争。如果一方进行军备扩张，势必导致另一方扩充军备。当一个国家武装自己时，其他国家不可能在国防上不作为而甘冒遭受侵略的危险……任何一国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会被其他国家注意到，进而引发后者的反制。”²

在20世纪20年代存在这样一种认知：国家间军备的施动—反应循环（action-reaction cycle）不受控制的升级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鉴此，国际联盟努力推动全球军备控制磋商。这些努力以失败告终，因为当1932年世界裁军会议（World Disarmament Conference）在日内瓦召开时，大萧条带来的混乱、日本在1931—1932年对中国东北的征服以及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意味着，裁军已不可能，战争则愈发可能发生。1936至1938年间，日本进一步蚕食中国，意大利入侵非洲，德国在欧洲不断扩张，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危机最终导致另一场欧洲战争在1939年爆发，并于1941年演变成世界大战。

在战争初期的两年半中，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接连遭受的军事灾难似乎印证了如下观点：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些大国未能通过有效武装自己而对侵略国形成威慑。维持现状的大国未能及时武装自己会引发战争——这一共同信念成为冷战初期对立双方均采取进攻性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超级大国间的核对抗不断升温，因而学界对军备竞赛的研究更加系统且紧迫。多数学者已就军备竞赛的定义达成共识，即军备竞赛是指“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激烈的竞争，每一方都努力提高本方军备或武装力量的数量和质量，以试图获得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地位”。³ 而关于其他基本问题，尤其是什么导致了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是否会独立发挥作用以及是否会导致战争等问题，学者们仍存在分歧。

冷战政治是导致学者们在研究军备竞赛时难以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方，坚信军备竞赛可能失控并引发战争的学者倡议与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与格雷勋爵一样，这些学者认为，互相怀疑和寻求安全使得国家针对彼此扩张本国军备，从而导致武装—反制性武装（arming and counter-arming）的恶性循环。

1 W.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Oxford, 1983, pp.185-236.

2 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 *Twenty-Five Years, 1892-1916*, Vol. 1, London, 1925, pp.89-90.

3 Hedley Bull, *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 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 in the Missile Age*, London, 1961, p.4.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军备竞赛不会通过施动—反应循环而独立发挥作用。在他们看来，军备对抗不过是更深层政治经济争端的表面征兆，而后者才是引发所有战争的元凶。这些学者指出，军备对抗中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它可能在螺旋升级中失控，而在于其中一方可能无法通过足够的军备达到威慑目的，从而使另一方获得政治优势，甚至是通过发动战争来充分利用其优势。“螺旋升级”模式与“威慑”模式的争论各有其政策内涵。一些人担心军备竞赛会在升级中失控，还有一些人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所称的“军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掌握了过大的权力，他们都建议应对苏联采取缓和政策，从而避免不受欢迎的核战争，同时减少军备开支。至于那些认为软弱可能诱发他国攻击的人，他们号召增加国防预算，进一步加强军备。在华盛顿，这种思维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第一任期内（1981—1985年）表现得最明显。里根政府中的强硬派人士认为，苏联政治体制中固有的进攻性特质是造就仍在进行的冷战和仍在扩充的庞大核武库的罪魁祸首，他们常常援引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试图说明未能通过武装去应对独裁政权的危害。¹

本文将以螺旋升级模式与威慑模式之间的争论为背景，重新评估1930年代大国间的军备对抗。本文指出，主要大国间的军事对抗逐渐发展为一个不受任何参加者控制的激烈军备竞赛系统，换言之，这是一个如螺旋升级模式所描述的军备竞赛。尽管军备竞赛本身并不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它确实独立发挥了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爆发时机及其在1940至1941年间的蔓延。对于认为战争的起因在于维持现状国家未能有效武装以威慑侵略者的普遍观点，本文提出了挑战。事实上，当时所有大国都加入了军备竞赛，就如何赢得它或至少是应对它有着周密计划。然而这场军备竞赛摧毁了它们的所有计划。

当时所有大国都加入了军备竞赛，就如何赢得它或至少是应对它有着周密计划。然而这场军备竞赛摧毁了它们的所有计划。

在详细讨论各国军备竞赛计划前，首先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0年中军备竞赛的根源和独特性进行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深刻地影响了如何针对未来战争而进行武装的思想，这场战争标志着军人对战争的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在1914年前，总参谋部仅仅通过衡量陆军和舰队的规模、质量和资金投入来评估各国的力量。在1914年，欧洲军队的推进是根据旨在取得迅速和决定性战果的进攻性计划。然而，这场战争却残酷地持续了四年，并促使参战各国政府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资源，不断加大对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动员。这使得战争由单纯的陆海军冲突发展为国家持久力的较量，或是逐渐为人熟知的“总体战（total war）”。它塑造了当代人理解冲突结果

1 James G. Wilson, *The Triumph of Improvisation: Gorbachev's Adaptability, Reagan's Engagement,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2013.

和预想未来战争方式的方式。所以传统认识认为，德国及其盟友之所以输掉战争，不是因为德国军队在军事上被击败，而是因为同盟国的经济崩溃和国民士气的瓦解，而这部分地是由于协约国方面的封锁。世界上的军人从1914至1918年战争中汲取的教训在参谋学院中被不断重复：要赢得下一场战争，必须有旨在动员国家的全部工业与人力资源的全面战前规划，还有食品以及铁矿石、煤炭、石油之类关键原材料的自足。换言之，“武装”的定义已被扩展，所包括的不仅有前线军事力量（即：广度备战，arms in breadth），还有整个经济和社会对于从事全面战争的准备程度和能力（即：深度备战，arms in depth）。¹

当然，在战争幸存者和战后成长起来的人的脑海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许多学者、实业家、官员、士兵和各种政治背景的政治家来说，这场战争提供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可能性：在未来，技术专家中的精英们可以理性地计划和经营整个工业经济与社会，从而实现宏大的政治野心。战后，大政府、多年的工业计划和指令性经济首先扎根于苏联。斯大林试图通过多个五年计划在俄国实现工业化，赶超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目标不只是建设社会主义，更是为了在与资本主义的最终对决中赢得胜利。在苏联官员心中，这场对决不可避免。在斯大林手下的诸多军人中，没有人能比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其时代中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之一）更热切地支持把苏联经济建设成一个巨大的军工复合体的想法。尽管战后的苏联在走自己的道路，但在20世纪20年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而言，压倒性的政治动机不是完善战时的集权化国家控制的做法，而是纠正1914至1918年的总体战导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畸变。

在20世纪20年代，战后解除动员措施的最主要功绩之一在于恢复了1914年以前的国际货币稳定和兑换机制，即金本位制。通过坚持金本位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促进了贸易和资本的跨国顺畅流动，同时也让自己受制于能够限制大规模军备扩张的严格的预算纪律。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打乱了战后解除动员措施的走向。在工业疲软、市场自行纠错失败和金本位制崩溃的作用下，一批虎视眈眈的官僚、军人和政治人物被推上权力岗位，他们梦想通过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实行国家管控来解决问题。总体战憧憬者的崛起对日本产生了最迅速的影响。由军官和有类似想法的文职人员组成的阴谋团体策划占据中国东北，从而使日本获得原材料，进而获得在未来发动总体战的工业能力。日本在1931至1932年对中国东北的征服，以及随后致力于将该地区建设成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举动，是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直接回应。²

1 Georg Thomas,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Wehr-und Rüstungswirtschaft, 1918-1943/1945*, Boppard, 1966, S.489.

2 Michael A.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1919-1941*, New York, 2013.

大萧条也与1932年的世界裁军会议在时间上重合。如前文所述,紧随着1931至1932年间日本对国联的挑战,以及1933至1934年间纳粹政权在柏林的上台,裁军谈判已无成功希望。希特勒在上台之时就确定了德国要通过战争征服欧洲的计划,首先是针对苏联,但最终也针对法国和英国。这就要求德国大规模扩充军备,同时动员整个经济与社会以支持一场总体战。简言之,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或者假如他压根没有上台,而某类军事独裁政权得以建立,那么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也许有可能达成某种裁军协定。然而,即便1932年在日内瓦可能错失了达成协议的机会,所错失的充其量不过是就欧洲的陆军和空军军力达成某个短命裁军协定的机会。即便军人独裁政权从1933年起替代纳粹党执政,当裁军协定的限制遭到抵触时,军人政权也难以抵挡进行军备竞赛的诱惑。无论如何,在1933年掌权的是希特勒。德国陆军部长冯·勃洛姆堡(von Blomberg)将军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与新政府结成联盟,无视德军于1919年战败后国际社会对它的限制和裁军,重新武装德国。当德国在1934—1935年开始重整军备时,英国和法国只能被迫接受裁军谈判破裂的结果——德国军备不受控制地扩张。

在政治学文献中,军备竞赛通常被描述为在国际体系中激荡的一波又一波的施动—反应。在激烈的政治冲突时期,正如通常所述,一国率先增加军备以获得相对于敌人的军事优势,而其敌手会同样增加军备以回应威胁,施动—反应的危险循环因应而生,最后或以战争告终,或陷入某种不稳定的僵持。例如,1914年以前的欧洲大国彼此间展开军备竞赛,它们相继建造更多更强大的战舰,同时打造比竞争对手动员得更迅速的大众兵役制军队。在冷战中,超级大国在相互刺激下储备了远超杀伤所需的核武器。¹

在20世纪30年代,大国间施动—反应的升级加快了舰船、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生产。越来越多的金钱、厂房、进口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被投入到大宗军需品的生产中,代价是减少本可带来创收的出口和降低生活水平,这为军备竞赛的参与者带来巨大负担。在参与军备竞赛的过程中,竞争者们发现,他们或自发地,或在日渐加剧的政治、经济和竞争压力下被迫地,要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卷入军备竞赛并非是政治上中立的行为。军备增长升级带来的症状,如官僚系统的扩张、多年工业计划以及社会控制等,似乎预示着重大的政治变革。随着军备竞赛的加剧,在探讨这些变革的涵义时,“未来战争(future war)”和“极权战争(totalitarian war)”这两个术语可以互换并非巧合。进行武装意味着要把整个国家变成精密的战争机器,而这台机器能在食物和工业原材料方面实现自给自足。这就是1914至1918年战争留下的普世军事—政治教训,同时也是驱使军备竞赛不断向前的赶超或认输(emulate-or-capitulate)逻辑。20世纪30年代的军

1 Barry Buzan and Eric Herring, *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1998.

备竞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像一台巨大的机器，迫使所有迅速扩充军备的大国愈发剧烈地采取“极权”行为。¹

1936年是个转折点。比照1933年的较低水平，到1936年全球军费支出已增至原先的三倍。部分地因为军备需求的激增，工业活动普遍地迅速升温，工业产量和原材料价格也随之快速增长。在经济萧条和军备竞赛的先后施压下，政府不得不更有力而持续地干预工业、贸易和社会。在军人看来，纪律严明的社会、国家管控的工业和对市场力量的压制不过是现代战争和军备竞赛合乎逻辑的必需。有时，他们会遭到实业家和政府官员的抵制；有时，他们则与志同道合的企业家和雄心勃勃的文官们一起为工业集中、自给自足和技术官僚统治而游说。因为未来战争很可能是“极权”的，主导性的政治主张倡导让国家权力更“极权”，让社会更“受管控”，让经济更为“计划性”和“自给自足”。当然，在要求步调一致的竞争性压力（competitive pressure to conform）面前，众人表现各异。有人拥护，有人反抗，而压力在持续增加。

将大国划分成两类——自愿的赶超者和被动的赶超者——有助于我们的分析。自愿进行赶超的是那些由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大国，而这些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大国迫切需要动员大众，从而在全面战争中保持钢铁般坚固的国家凝聚力。事实上，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当权派之所以拥护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因为后两者能够为了将来的战争而严密管控社会大众。

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很快击败表明，意大利军事准备的现实与墨索里尼关于意大利在为总体战做准备的夸夸其谈相差甚远。资源贫瘠的意大利过于依赖国际贸易和原材料进口，无法将自身转变为有效的卫戍型国家（garrison state）。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无法弥补它在必需工业资源方面的不足。法西斯政权试图在军备竞赛中不落下风，同时拒绝采用与意大利国家资源相匹配的其他军事—政治战略。这些事实充分表明，未来总体战的观念和对“大国”的理解在刺激国家追求军备、自给自足和社会控制方面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在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世界中，”墨索里尼解释道，“放弃自给自足的武器意味着，将来在面对战争时，要任由战争资源充足的国家摆布。”² 墨索里尼在1936年3月号召进一步寻求国家的自给自足，这并非巧合。此时，墨索里尼的经济官员已经对主要的武器供应商进行了重组，使之成为实际上由国家掌控的工业企业。

无独有偶，日本也是这样做的一个典型国家，它被军备竞赛推拉到一个因其资源稀缺而无甚意义的方向上。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围绕国家资源和国家战略优

军备竞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像一台巨大的机器，迫使所有迅速扩充军备的大国愈发剧烈地采取“极权”行为。

1 Joseph A. Maiolo, *Cry Havoc: How The Arms Race Drove The World To War, 1931-1941*, New York, 2011.

2 Maiolo, *Cry Havoc*, pp.154-155.

先性进行的多年争吵不过是雪上加霜。尽管日本一直努力将中国东北发展成一个巨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但未能如愿。更糟糕的是，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刺激了苏联在西伯利亚—中国东北—蒙古边境的军备扩张，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亚洲大陆局势。1937年夏天中日战争的爆发为日本采取严苛的动员法令铺平了道路，日本引入集中经济计划，对经济和社会采取进一步军事控制。但是新的多年计划和更有效的资源分配无法克服一个基本问题——日本缺乏足够的工业能力、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与苏联和美国竞争。

德国拥有比意大利和日本更庞大的工业经济，但它成为军备竞赛领跑者的能力总是受限于铁矿石、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进口数量。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宣称，德国人“更爱枪炮而不是黄油”，但德国只能通过出口来偿付进口，不得不向外出售在军备制造中至关重要的钢铁来赚取外汇。这一局限在柏林的军队精英、中央银行家和希望在世界出口市场上分一杯羹的企业家之间引发了无休止的争吵。对银行家和企业来说，军备扩张不过是使德国经济摆脱大萧条并恢复德国政治独立性的临时手段。但是，对格奥尔格·托马斯上校（George Thomas）——最高统帅部战争经济部门的主管——这样的主要军事计划者来说，军备扩张是为了重组德国经济以发动全面战争。阿道夫·希特勒也认同后一种观点。希特勒在1936年8月撰写了“四年计划”备忘录，其中要求德国经济应该通过充分开发国内原材料与人造替代品来实现自给自足。

德国四年计划的公布——在墨索里尼的1936年3月自给自足演讲后接踵而至，并恰逢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末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驱动军备竞赛的机制。四年计划是体现军事—经济方面的赶超和趋同的深思熟虑行为。其动力与其说是担心苏联军备的快速增长，不如说是对苏联军备扩张模式的艳羡。

德国空军总司令、希特勒的亲密下属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亲自负责四年计划的实施。戈林的官僚机构迅速膨胀，并受到雄心勃勃的青年企业家的热切支持，这些企业家迫切地想将戈林能够支配的大量资金用于以前无利可图的制造业领域。尽管四年计划能够在某些经济领域取得成功，但问题在于，德国没有能力同时实现军事力量扩张（广度备战）和自给自足（深度备战）。而且，这一计划无助于克服未来几年的快速军备扩张面临的主要瓶颈——钢铁短缺。正如戈林在1937年早些时候所承认的，当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军备扩张势头正旺时，德国的军备扩张陷入了“停滞”。

回到1933年，当时斯大林和他的核心圈子还对苏联的军备充满信心，但到1936至1937年间，军备竞赛的发展，尤其是德国军备的扩张已经摧毁了他们的自信。从流水线上生产的武器装备的数量惊人，却仍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与此同时，飞机、坦克和枪炮的复杂性进而是成本在迅速提升，军人们向经济官员大发牢骚说，他们的卢布产出的东西要少多了。维持军队与经济官员之间的对立是斯大林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策略的重要一环，此举有助于确保斯大林的执政

地位。¹ 此外，恐怖统治和对精英的肃反也是重要手段。1936—1937年间的“大清洗（the Great Terror）”的发动与军备竞赛的升级是同时存在的，这并非偶然。斯大林认为，党和军队内部的清洗是军备扩张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清除那些在危机中可能靠不住的党内干部和部队军官，用新的精英取而代之，能够使苏联经受住总体战的考验。有鉴于此，图哈切夫斯基这位才华横溢却喜怒无常的战争规划者被免职并以谋反罪被处死就不足为奇了。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与斯大林谈论工作时，图哈切夫斯基经常表现出一种不好的习惯：过于强调军事需要，以至于要求整个苏联经济从属于苏联红军规划部门的领导。这与要求军人治国几乎仅有一步之遥。尽管图哈切夫斯基作为有创见的思想家和红军成功的“大纵深战役（deep battle）”军事理论的缔造者之一而广受称赞，但斯大林很明显不希望在危机时刻有这样一位崭露头角的拿破仑·波拿巴在身旁。²

接下来我们将转而讨论被动的赶超者：法国、英国和美国。20世纪30年代，当军备竞赛加速而另一场大战苗头初现时，有这样一种观点广泛流行（尽管很大程度上并不正确）：那些已经践行“极权主义”的国家在大举动员社会和经济力量以准备总体战的竞赛中更易旗开得胜。讶异于德国的军备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如脱缰之马般的扩张，奉行自由主义的大国不得不奋力解决一个问题：在不屈从于极权主义的同时，如何能够武装自己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极权主义战争”威胁？

在这一政治困境面前法国面临最大挑战，因为此时法国内部已经存在右翼和左翼的对立。1936年6月，社会主义者莱昂·勃鲁姆（Leon Blum）作为左翼联盟“人民阵线”（the Popular Front）的领袖当选为法国总理。此时，法国不仅遭受着大萧条带来的经济萎缩，还面临纳粹德国军备扩张带来的巨大安全威胁。勃鲁姆在竞选中承诺，将采取类似罗斯福总统1933年在美国实施的“新政”式国家投资计划来扩大就业，并通过裁军谈判维持和平。但是，仅仅上任几个月之后，迫于军备竞赛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德国的威胁，以和平为己任的勃鲁姆启动了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备扩张，将许多武器工厂，尤其是几乎全部飞机制造工业纳入国有化经营。同时，勃鲁姆政府还大幅削减社会开支和就业计划。不幸的是，预计法郎将会贬值的法国投资者开始向外输出资本，此举在客观上使勃鲁姆的开支计划化为泡影。

包括勃鲁姆及其顾问在内的许多法国人怀疑，一个自由的金融体系是否与对抗德国所需的庞大扩军努力相匹配。似乎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是，法国应该加强对货币流动和贸易的控制，正如日本、德国和苏联所做的那样。但是，勃鲁姆拒绝对货币流动和贸易实施国家控制。一方面，这是因为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将疏远巴

1 Mark Harrison, *Guns and Rubles: The Defence Industry in the Stalinist State*, New Haven CT, 2008.

2 Lennart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Economic Planning, 1925-1941*, Basingstoke, 2000.

黎与华盛顿和伦敦的关系；另一方面，勃鲁姆认为金融控制将把国家引向法西斯主义。在军备竞赛中实施极权主义措施的同时如何维持经济的自由运转？这一难题使得人民阵线政府进退维谷。直到爱德华·达拉第（Edward Daladier）在1938年当选为法国总理，一个差强人意的解决办法才被想出来。和勃鲁姆一样，达拉第也是左翼人士，但是他愿意在政治上向右靠拢以使法国在军备竞赛中不落人后。在支持工人还是支持雇主和资本家的选择面前，达拉第选择了后者。从1938年11月起，达拉第开始中止勃鲁姆先前提出的许多进步的劳工法律。在笔者看来，1938至1940年间担任法国总理时，达拉第仿效德国和意大利，通过整肃工人和整合大企业来全速扩张军备。这一举措本可以取得显著成效，之所以未能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其身处保守右翼的新盟友担心，任何增强国家对经济管控的举措将使国家走向共产主义。达拉第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困境。

在英国，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931至1937年担任财政大臣以及1937至1940年担任英国首相时，坚信他已找到避免采用极权主义手段的办法。在张伯伦看来，威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英国重整军备之初，张伯伦就主张建设一支庞大的空军作为威慑手段。主要依赖空军力量以防止战争，会使英国的经济不会在陆军军备扩张的重压下崩溃。在张伯伦看来，迫使希特勒参与谈判，避免英国卷入法国及其盟友的同盟中，是维持欧洲和平和英国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理想之举。然而，空军建设从未起到张伯伦所设想的全面军备扩张安全阀的作用。尽管英国空军大幅扩张，德国扩军却从未停止，英军的参谋长们亦不断敦促加快军备建设，国家也开始干预经济，这一切合起来挫败了张伯伦想要控制军事开支的尝试。1938年9月，英国内阁意识到，英国已经达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在和平时期所能实现的经济与政治的极限。正如英国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所说，英国无法在军备竞赛中与德国匹敌，“除非我们变成另一种国家”。¹

1938年8月，臭名昭著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这标志着张伯伦通过外交手段避免与德国开战的尝试走到了尽头。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希特勒以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身为少数民族的德意志人受到捷克统治者迫害为由，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德意志人占多数的边境地区割让给德国。尽管希特勒在公开演讲中宣称，他所希望的不过是修正边界以使所有德意志人回归祖国怀抱，但其真正目的是希望挑起一场速战速决的小型战争以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是法国的盟国，后者要对其安全负责。随着危机在1938年9月开启，法国陆军和英国皇家海军开始进行动员。尽管英国内阁希望避免欧洲战争，但所有人都明白，一旦英国最重要的盟友法国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开战，英国将无法置身事外。张伯伦试图通过与希特勒面对面谈判商讨领土转让问题来解决这一危机。这位英

1 Maiolo, *Cry Havoc*, p.251.

国首相希望，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将为军备控制以及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欧洲的其他争端铺平道路。

尽管希特勒的初衷是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与英法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险。与此同时，希特勒的主要军事顾问警告他，德国绝无可能在一场实施全面动员的持久战中打败英国和法国，尤其是后两者很可能得到美国 and 苏联的支持。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1938年5月告诫说：“如今德国所处的军事—经济局面十分不利，甚至比1917和1918年时还要糟。由此可见，德国没有能力赢得一场持久战。”¹ 希特勒被吓阻并同意谈判。1938年9月29日，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齐聚德国慕尼黑，同意将德意志人占多数的捷克领土移交给德国。次日，希特勒与张伯伦签署协定，同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欧洲争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慕尼黑协定并未迎来和平与裁军的新时代；相反，这次会议激化了军备扩张和政治冲突。会议结束几周后，德国、英国、法国、美国 and 苏联的军备扩张骤然升级。由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有限战争因法国和英国的战备以及张伯伦的外交而受阻，希特勒感到愤怒，并下令加快海军、陆军和空军建设。这一扩军计划从一开始就明显不切实际。然而，到1939年春天，希特勒才意识到德国的经济不足以应付军备扩张，而在此时，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都在加快自身的军备生产。当希特勒意识到德国无法在军备竞赛中取得胜利时，他决定铤而走险。与20世纪30年代的正统观点——关于未能用武力抗击独裁者的道德说教——相反，事实上德国的对手很早就开始备战，并有足够的资源赢得军备竞赛。真正的问题是：威慑为什么在1938年阻止了德国攻击捷克斯洛伐克，而在1939年则未能同样地阻止希特勒进攻波兰？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军备竞赛升级的性质本身。

希特勒的进攻性战争与征服计划假定，德国能在避免刺激周边大国扩张军备的前提下获得军事优势。他错误地假定当德国在军力上遥遥领先时，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会袖手旁观。1937年底，德国的军备扩张陷入停滞。这时，希特勒开始意识到，德国通过更早和更快扩军而取得的优势很快将被那些抵制德国扩张的国家不断加速的军备扩张抵消。希特勒感到时间对其不利，这一点很好地说明了军备竞赛是如何驱动世界走向战争的。和所有的历史进程一样，军备竞赛不时发生。它们一经启动，早期行为的各种并非出于本意的后果就不可能被抹掉，不可能退回初始状态。逐步升级的军备竞赛会很快侵蚀掉领先者的优势。时间本身成为政治与战略竞技场上的一名重量级选手，会站在某些大国一方，而给另一方带来不利。首先是在柏林，随后是在罗马，最后在东京，军备竞赛驱使着领导人们认为机不可失且失不再来，决定发动战争。1939年八九月间，希特勒认为

1 Maiolo, *Cry Havoc*, p.266.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着全面战争的危险进攻波兰；1940年6月，当法军败像已现时，墨索里尼及其幕僚决定站在德国一方参战；1941年底，日本领导人决定对英国和荷兰在东亚的领地以及正在加速备战的美国发起进攻，而不再听任日本资源基础的萎缩和美国海空力量的增强。

但是，军备竞赛的潮汐般效应并未使战争成为唯一选择。对意大利和日本来说，其他选择并非不可想象。真正使欧洲冲突不可避免的是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决定。然而，正如许多学者常常指出的那样，希特勒并未按其初衷在英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对苏联大打出手。相反，他挑起了德国与法国、英国的正面战争。军

希特勒不想被压制，决定冒险与一群敌人展开全面战争，尽管这群敌人相对于正显疲态的第三帝国拥有压倒性经济优势。

备竞赛可以解释为何事态如此发展。希特勒正在输掉这场竞赛，并对此一清二楚。希特勒不想被压制，决定冒险与一群敌人展开全面战争，尽管这群敌人相对于正显疲态的第三帝国拥有压倒性经济优势。正如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所言，德国与其敌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远超大多数当代专家的想象。¹ 让希特勒冒险去打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的决定更令人惊讶。经济上的轻量级选手意大利和日本也走上了毁灭之路，这倍加令人惊讶。

美国人卷入欧洲和亚洲危机的事实表明了军备竞赛是如何对自身的升级和战争起到推动作用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当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呼吁欧洲裁军时，美国只维持了海军和空军最低限度的增长。直到1938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军备扩张。罗斯福命令大力扩充美国空军的规模并提升飞机制造能力。根据1938年11月一次白宫会议的记录，罗斯福显然想推行遏制战略。他希望通过向英国和法国出售它们所需要的飞机来威慑希特勒。当战争爆发时，罗斯福决定让美国置身于外，但美国将出售盟国获胜所需的轰炸机。

美国愿意向英法出售飞机，这对后两者的战争努力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当德国进攻法国时，西方同盟在军备上已经遥遥领先。战争的爆发去除了法英两国在和平时期全面备战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障碍，因为在战时英法两国可以引入紧急动员法，允许加大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这种管控事先已被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苏联采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939至1940年间，法国的飞机、坦克和其他军火的产量显著攀升。当德国于1940年5月进攻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时，西方同盟在军备的数量和质量上具有很大优势：400万盟国军队对阵300万德国军队；盟国有14000门火炮，而德国的数字是7378门；盟国部署了4204辆坦克，德国的数字是2439辆。盟国的空军力量同样具有优势：相对于德国的3578架飞

1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London, 2007.

机，盟国总计有飞机4469架。¹更重要的是，当英国和法国在动员庞大的人力和物力以进行持久战时，德国的经济潜力已近乎穷尽。凭借着巨大的海军优势，英法能够与世界市场连通，同时让德国得不到来自海外的工业原材料供应。

希特勒及其麾下的将军明白，他们仅有一次机会发动一场进攻，一旦未能取得显著战果，战争必败。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计划去突破法国的防线，并用大迂回包围了盟国陆军的精锐部队。这一计划发挥了效用，并导致了法国的战败，这在几十年来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主题。尽管历史学家们一度倾向于认为，德国在1940年五六月间对法作战的胜利要归功于其出色的作战学说(fighting doctrine)，但近年来许多专家对这一观点提出挑战，认为德国的胜利是运气和同盟国情报失误的产物。²无论如何，对法国的胜利并未解决德国的经济困境，尤其是苏联和美国不约而同地再次加快了战备步伐。事实上，希特勒决定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和扩大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意识到，要抢在英美联盟在西线站稳脚跟并派大规模轰炸机编队出现在德国天空之前，率先摧毁东线的敌人。换言之，对于扩大冲突并将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卷入战争，军备竞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法国在1940年五六月间失败时，罗斯福的遏制战略同样失败了。通过向英法提供以飞机为主的武器装备来击败德国，这一策略原本可以使美国免于进行大规模军备扩张。从法国战败到希特勒于1941年（译者注：原文误写为1940年）6月进攻苏联的几个月中，美国总统承受了要求打造“北美要塞(fortress North America)”并以令人窒息的高速对工业生产进行动员的巨大压力。罗斯福总统一直抵制这一做法，同时他拒绝任命一个“军备沙皇(arms czar)”来控制美国经济。一些历史学家批评此举延缓了美国的战备。众所周知，罗斯福的真实想法没有多少见诸纸面，因而常常难为后世所理解。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担心允许权力向新的动员机构倾斜很可能使美国面临如下危险：军国主义可能成为常态，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可能走向终结。当罗斯福促成了著名的《租借法案》以为英国提供战争支持，并于1940年11月史无前例地赢得了在白宫的第三个任期时，他认识到，可能发生的更糟糕的事情就是英国投降。这将使美国处于一个由法西斯联盟控制的世界中。为了对付接踵而至的冷战，被大众性恐惧驱使的美国政府将被迫以极权主义手段备战，从而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后，罗斯福认为，要想避免上述情形发生，必须赢得对德战争，而后者只能通过把美国变成一个在他控制下的庞大战争机器——著名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才能实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这解除了和平时期的政治对美国经济的限制，激起美国战时军工生产的高潮，这是盟国制胜的

1 Maiolo, *Cry Havoc*, pp.337-338.

2 K-H Frieser, *The Blitzkrieg Legend: The Campaign in the West, 1940*, Annapolis MD, 2005.

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这解除了和平时期的政治对美国经济的限制，激起美国战时军工生产的高潮，这是盟国制胜的关键。

关键。¹

在欧洲，德国挑战现状的行为引发了军备竞赛，而希特勒的侵略决定最终导致战争。但是，一旦军备竞赛从1936年起愈演愈烈，它就挫败了各主要大国试图掌控或应对它的野心。德国进行军备扩张的行为先后激起了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反应。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各自的方式，试图通过军备扩张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形成威慑，避免其发动侵略性战争，同时迫使它们回到谈判桌前。这些战略之所以未能成功，并非由于维持现状的国家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及时完成军备扩张，而是因为军备竞赛本身破坏了威慑战略。预料到无法在军备竞赛中占据上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先后做出决定，宁可冒险承受战争的不确定性，也不愿接受在军备竞赛中注定失败及其必然的政治后果——国际现状的维持。

(年玥 译；梅然 校)

1 Richard J.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London, 1996.